

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奇迹的内涵、归因与展望

方 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 文章对中国奇迹进行四层次归因, 认为中国奇迹不仅源于关键要素的改善, 更源于改革开放进程中践行的“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向”“微观、宏观领域协同并进”“发挥市场沟通协调的作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四个原则。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坚持自己的道路, 不遵循主流理论的“非凡”选择, 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既充满神奇的色彩, 又富于共享性。当下, 中国面临动能转换、逆全球化等诸多挑战, 必须跳出“快”的意识, 站到世界、中国和人民的维度, 寻找延续中国奇迹的途径。

关键词: 中国奇迹;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8) 08-0001-09

中国奇迹是指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出的不平凡选择以及由此取得的不平凡成就, 体现为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逻辑上看, 认识中国奇迹需要依次回答四个问题: 其一, 中国奇迹这一说法的来源? 是中国人的自我评价还是国际社会的统一认识, 是否达成共识? 其二, 中国奇迹的研究进展如何? 中国奇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有哪些具象化的表达? 其三, 中国奇迹的归因有哪些? 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借鉴, 是否具有共享性? 其四, 中国奇迹是否可以持续, 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如何客观地看待中国奇迹的延续性?

一、中国奇迹说法的来源及争论

1. 中国奇迹说法的溯源

1993 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中, 分析了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发展经验, 称这些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东亚奇迹”。1994 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在《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指出,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① 自此, 中国奇迹的说法开始流行。该说法的逻辑线是: 从增长率来看, 中国与“东亚奇迹”地区不相上下, 但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 如果其他国家(地区)被称为“经济奇迹”, 也应当给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冠以“奇迹”之名, 而且经济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不能不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学术上的好奇。^②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8BJL022)。

作者简介: 方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经济治理。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2-3 页。

^②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3 页。

中国奇迹这一说法早期指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主要是经济的超常且持续增长。通过比较40年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超常”的内涵。首先,经济体量显著壮大。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78.7亿元(世界排名第15位),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82.7万亿元(世界排名第2位)。^①世界银行估算,1978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2%,2017年这一比重达到15%左右。其次,经济增速明显占优。1978—201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3%(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明显高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及其他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各国增长乏力,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基于此种背景产生奇迹一说,也就不足为奇。最后,经济增长持续时间长、有韧性。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升级为工业国、制造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经济角度仅反映了中国奇迹的一个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奇迹涉及的领域逐渐拓展,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正如胡鞍钢和王洪川所言,中国的人类发展奇迹比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更令人惊叹。^②

2. “有没有”“算不算”的争论

中国奇迹这一说法提出的初期来自于国外的质疑之声不断。因此,讨论中国究竟“有没有”“算不算”奇迹便成为早期研究的焦点。由于对中国奇迹的早期界定来自于“东亚奇迹”,一些学者通过质疑“东亚奇迹”来反对中国奇迹。

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指出,东亚经济增长依靠的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不具有可持续性,东亚奇迹并不存在。山田充彦和陆庆胜强调,中国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类似,但不能确定究竟是“奇迹”还是“幻影”。^③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在《崛起的亚洲》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以往的国际经验相符,没有超出历史已有的经验,并不存在中国奇迹一说。面对质疑,中国学者指出,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较低劣的初始条件下实现了非标准结构模式的成功发展;^④东亚奇迹是传统农业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结果,虽然非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够显著,但劳动力结构转换仍然推动经济实现了持久的高速增长。^⑤

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奇迹的质疑之声逐渐消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奇迹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证,而且以发达国家为范本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现象上苍白乏力。“华盛顿共识”没有重振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经济,反而让这些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减轻资本主义危机,反而导致全球范围内更大程度、更高频率的经济波动。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奇迹的认同不断强化,各界开始关注于为什么产生中国奇迹。

二、中国奇迹的研究进展及具体内涵

1. 中国奇迹的研究状况

学术界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1998年对中国奇迹的讨论围绕“经济”展开,主要以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经济增长、经济改革为切入点,关注外来投资、东亚奇迹问题,比较优势理论运用较广;1999—2008年的研究重心开始向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转移,研究内容向人力资本、投资动力、创新和意识形态拓展;2009—2018年学术界主要围绕“经济”讨论

① 197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2017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胡鞍钢、王洪川《中国人类发展奇迹(1950—203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③ 山田充彦、陆庆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奇迹”还是“幻影”》,《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期。

④ 杨先明《从发展过程看东亚经济奇迹》,《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⑤ 陈宗胜、黎德福《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再解释》,《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

中国奇迹的趋势开始弱化，社会主义与经济增长成为核心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较多，学者们开始从经济新常态、政党、人口红利、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以及农民角度思考中国奇迹。

2. 中国奇迹内涵解析

在已有研究中直接阐述中国奇迹概念的较少，学者多是先从中国经济增速的“不凡”来解释奇迹，后将人民生活水平、政治、社会、科学技术、减贫等领域引入对奇迹的阐释之中。

本文认为中国奇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从结果来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超越世界上其他国家既往经验的成就。从过程来看，中国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但与主流理论不一致（甚至相悖）的改革方案。各界对中国奇迹的关注表现出从结果向过程转变的特征，更加重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这些关系着中国成功的改革实践。从结果来看，中国奇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都提高了 20—30 倍（按 1978 年不变价估算）。根据《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7 年中国创新指数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 22 位。根据世界银行 2015 年最新收入分组标准，1978 年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2017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接近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均值。

第二，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最具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9 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的领导权持续转移，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再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 世纪又从美国向亚洲转移。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只是暂时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①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提升表现在如下几点：（1）在等级化劳动分工中，中国具备了向世界体系中心位移的条件。世界体系中心的分工特征是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密集的资金，2017 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7.5%，^② 对外直接投资 1246 亿美元，资本不再是羁绊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2）中国从“被全球化”向“主动全球化”转型，典型表现即是“一带一路”倡议。（3）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国际话语权明显提高，在环境保护、国际安全、全球经济和政党治理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

第三，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按照当年农村贫困标准，1978 年农村贫困人口为 7.7 亿，贫困发生率为 97.5%；按照现行国家贫困标准，2017 年农村贫困人口降至 3046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3.1%。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标准不断提高，1978 年的贫困标准是“一条低水平的生存标准”^③，主要保证每人每天的食物支出，2008 年的标准是在 1978 年标准的基础上扩展非食物部分，保证贫困人口“有吃、有穿”，2010 年的标准是结合“两不愁，三保障”原则提出的，用以保证贫困人口基本稳定温饱。中国的减贫对世界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1990—2013 年世界贫困人口减少 11 亿，其中中国减贫人口 7.3 亿，占减贫人口总量的 2/3。

三、中国奇迹的四层次归因与共享

1. 中国奇迹的四层次归因

已有研究对中国奇迹的归因主要从要素数量和质量变化、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角度切入，是对

①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第 8 页。

② 杨舒《2017 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7.5%》，《光明日报》2018 年 1 月 10 日。

③ 鲜祖德、王萍萍、吴伟《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统计研究》2016 年第 9 期。

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本文认为,可以围绕改革形成的框架分析中国奇迹的成因:第一层讨论集中在改革方向上,明确社会主义、“中国式”“中国化”与中国奇迹的关系,第二层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角度讨论改革对中国奇迹的作用,第三层集中分析市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市场、政府关系的调整,第四层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中国奇迹的作用。

第一层,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向。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探索就是要在中国的应用场景中找出路,其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的现实结合。由此,中国奇迹的诞生源于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是在中国的既定现实上探索出来的新路。

第二层,推进微观、宏观领域协同并进。中国奇迹着力于微观激励和宏观调控,市场游刃于微观与宏观之间,建构了二者沟通之桥,保证了经济的协调运行。从时间上看,中国前20年的改革集中在微观领域,后20年的改革则倾向于宏观。中国改革的特点是从微观切入,通过让微观经济单位获得新增资源的部分配置权,带动资源配置制度改革。^①微观领域的改革带有“增量改革”的气质,着眼于在增量上运用新的机制,在加大激励、提高效率上有所建树。

如农村改革未涉及所有权,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适了生产资料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让农民掌握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围绕所有权、经营权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4年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扩大自主经营权阶段;1984—1993年是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转换经营机制改革阶段,^②主要围绕所有权过渡和实施进行战略性改组;^③1993—2002年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④明晰产权、管理科学、明确权责是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思路;2003年至今是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特征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阶段。与国有企业改革并行的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将个体经济、合作经济作为公有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此后,公有制以外其他经济形式对中国奇迹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对微观领域的改革有两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一种是对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谁更成功的比较。有学者认为,农村改革比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原因在于国家对集体经济的控制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做保证,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基础上。^⑤另一种是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的比较。有学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是中国奇迹的重要源泉,贡献较大。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属于“增量定义”的部分,这一说法与一些支持增量改革的学者想法吻合。

中国奇迹的产生与中国政府在宏观领域的积极参与不可分割。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当性、调控内容以及调控方式是中西方经济学家争论的关键。有商品、生产要素交换和转移的地方就有市场,只要存在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交换和流通的地方就存在市场。市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上,代表效率的价值观趋向。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坏不止资源配置这一个方面,还取决于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政治环境是否稳定以及国家主权是否完整独立。因此,在市场之外,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与公平相关的分配问题、与稳定相关的政治问题以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际关系等问题上。政府介入宏观领域的主要原因有:市场调节只能解决微观平衡问题;市场机制反馈现有的生产和需求结构,不能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目标提供信息;^⑥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市场机制有效率但并不能保证公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② 黄速建《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演进与经验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10期。

③ 陈瑞等《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述评》,《现代管理科学》2018年第1期。

④ 李荣融《宏大的工程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求是》2008年第16期。

⑤ 许经勇《我国农村的两次历史性变革——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城镇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⑥ 徐双芹《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经济问题》1994年第10期。

平；在市场经济中壮大企业所需。^①

关于政府如何带动中国奇迹这一问题，学者们看法不一。有学者指出，是分成合约下的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学者强调，是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放权、将集中于政府的资产分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中国奇迹；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奇迹是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良性互动的结果；还有学者将中国奇迹归因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结果。

微观之下的讨论集中在生产要素层面，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增长归因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且更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内生增长理论开始重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要素。学者们习惯运用经济增长模型，将重心集中在土地、人口和技术进步。对土地红利的讨论集中于红利的产生与分配，土地红利产生于土地用途转变的过程中，城镇化和工业化使土地利用价值上升。^② 对人口红利的关注集中于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以及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蔡昉等指出，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加和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是人口红利的主要特征。^③ 人口红利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影响经济。^④ 从时间上看，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21 世纪第一个十年越过红利拐点，将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转向人口负债。21 世纪初期多数学者认可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的高投入，但技术进步率偏低。随着技术进步与物质资本积累不相关假设的突破，学者们开始讨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高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⑤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技术创新，技术效率贡献度不高。^⑥ 也有学者讨论资本化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强调改革开放前 20 年经济资本化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内部，近 20 年来资本化对中国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产生正面影响，但不利于技术进步。^⑦ 这些结论对修正、加深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有一定作用。

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常规要素”，学者们可能会反对将其归入中国奇迹的讨论。但即使是同一要素在中国的表现也与众不同。如城乡土地的性质使土地红利来源具有中国特色。再如，中国人口红利的规模性、流动性和结构特征，使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路径与他国不同。因此，将生产要素屏蔽在中国奇迹的讨论之外，并不合理。

第三层，发挥市场沟通协调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微观和宏观两大领域在决策、信息和动力方面的沟通，保障了中国经济的协调运行，但市场化并不是中国成功的唯一主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思潮影响下陷入经济衰退的事实证明，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不会自动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⑧ 中国的成功在于将市场经济的长处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这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实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经历了多个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呈现融合互动、让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特征。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三大强调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

① 王璟 《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宏观经济管理》2017 年第 S1 期。

② 魏建 《土地红利的生成与分配：政府的贡献和让渡安排》，《东岳论丛》2014 年第 1 期。

③ 陆旸、蔡昉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世界经济》2016 年第 1 期。

④ 郭晗、任保平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代财经》2014 年第 3 期。

⑤ 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 《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经济研究》2007 年第 11 期。

⑥ 苏治、徐淑丹 《中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测度——基于创新与效率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7 期。

⑦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张平等 《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⑧ 洪银兴 《在发展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华日报》2016 年 4 月 8 日。

⑨ 张宇 《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2016 年第 6 期。

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市场观与西方市场观的本质差别在于中国明确地将市场作用定位于“资源配置”，将政府作用定位于“配合市场发挥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在其他领域）作用，二者存在分工差异。考虑到市场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微观主体，政府在微观主体上要以“放开”促进“搞活”，实现激励。微观主体的决策是现时的、缺乏远见的，政府要在中宏观领域做好中长期规划（如产业政策、调整发展比例关系等）。考虑到市场的资本属性，为了防止垄断等问题，政府需要对市场进行规制。

第四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保障中国奇迹可持续的要素有很多，政治稳定和对外开放是关键。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经济发展的土壤。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政治的稳定性往往被西方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忽视，很少纳入讨论框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认为，西方宣传机器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和西方模式遭遇的困境绝口不提，导致西方世界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相对平和的政治民主发展全然不知。^① 华生指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双轨制，经济上的双轨制是没有实现的政治条件的。^② 学者们对政治稳定与中国奇迹关系的阐述是间接的，但一些见解值得参考。如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道路，^③ 保持国家转型的政治稳定条件是转型由控制局势能力较强的政府发起、经济分配相对公平。^④ 政治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前提，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战乱或动乱背景下吸引大量国际投资，中国的政治定力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保障。

对外开放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实现技术进步、扩大市场的主要策略。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外来资本的支持，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开放让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显现出来；开放降低了学习成本，技术扩散促进了产业升级；外资主导型的外贸发展快速地提升了中国的出口能力，开放型增长使中国很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要素集聚；对外开放与市场化形成合力，贸易开放对沿海地区作用更大，市场一体化对内陆地区影响更重要。^⑤

2. 中国奇迹的共享性

中国奇迹不是单一要素或某几个要素合力的结果，而是中国在改革进程中一以贯之地坚持本国道路，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而灵活地运用全球资源，基于发展实际制定战略，不遵循主流理论的“非凡”选择。

学者对中国奇迹的讨论是期望此种思考在造福中国的同时，也能造福全人类。但是，西方国家与中国站在各自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的基石上，对中国奇迹的归因不同。西方经济学重视微观领域的经济增长要素，把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分工置于市场的大背景下，由此生成各种解释。源于微观视域的解释，只能是局部的、非系统的、碎片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脱离微观的场域后解释力便迅速下降。本文认为，微观领域的正常运行至少取决于三点：一是政治稳定的条件下，人们才会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资本才愿意投入到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去。二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定了中长期规划，注重当下及长远的发展。三是通过宏观领域的协调，政府能及时纠偏微观领域的失灵。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微观层面向西方学习，不断尝试建立一个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宏观层面的调控使国民经济在发展上可以兼顾当下与中长期目标，对微观失灵导致的各部门比例失调的问题

① 洛丽塔·纳波利奥尼 《中国正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

② 华生 《中国未来的发展改革与迄今的经济增长奇迹》，载陈昕主编 《“中国奇迹”20年：滴水湖会议实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③ 刘培林 《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的共同特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

④ 肖克 《国家转型中政治稳定维持经验的国际比较及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⑤ 盛斌、毛其淋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世界经济》2011年第11期。

也有纠偏作用，对巩固投资者的信心和强化人民对未来的美好预期有正面影响。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府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在宏观层面的调控能力不足，源于其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缺乏国有资本的强大支撑，在资源分配上缺乏实力。以两党制或多党制为特征的政党制度增加了执政的不确定性，降低了政府制定中长期规划的积极性和可信度，政党围绕选票、选民展开竞争，使执政“许诺”止于民生改善，必然削弱国家对战略布局的热情。中国奇迹正是体现在政府对宏观领域的突破，形成了中国模式。当前，学界对中国模式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制度特征。^②

市场是连接、贯通微观和宏观的桥梁，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对外开放、拓展全球市场、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丰富市场主体，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对市场作出的有序而系统性的改革。

在改革进步把控上，中国也可以和世界分享经验。中国奇迹的产生源于改革的“慢进度”。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先易后难，避免社会的过度动荡。^③ 增量改革（渐进性改革）在体制外推进，回避了尖锐的冲突。中国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丰富经济形式的同时，回避了过激的体制内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鼓励创新、创业也是鼓励增量改革。有研究表明，以新企业形成特征的“市场进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国际比较也证实了市场进入率是解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④

四、中国奇迹面临的挑战及延续性问题

1. 延续中国奇迹面临的挑战

延续中国奇迹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有些是内部的，有些是外部的。对这些条件要从静态结构、动态趋势两个方面去思考。既要“量变”作出反应，也要对“质变”作出研判。

过去的动因是否能继续带动中国奇迹？从生产要素来看，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都在消减，只能在结构上做文章。对外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实现追赶但不能实现超越，靠“引进”求“先进”的办法已经过时。在经济增长的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必须在原始创新上实现突破。从完全封闭到逐渐开放，从分割到一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释放了市场能量，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过去 40 年靠“放开”激活市场主体的方式，未来还需继续。未来的“放”要在风险防范和规制市场的条件下做到精细而非粗放。在改革进度上，以增量改革为主会逐步向“增量+存量”过渡。经过 40 年的改革，存量变化的尖锐性有所降低，也到了必然要改的阶段。

“逆全球化”是否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各界对“逆全球化”现象给出了诸多解释。从系统角度来看，全球化给一国带来的最大转变是把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延伸至全球，将国家和人民置于更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危机之中。这是一种发散的力量。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良好运行，资本全球化就会助推这股力量，使经济系统的国家边界更加模糊，企业将生产制造、非核心服务职能外包，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领先的产品上，全球化则在市场化基础上，通过分工把各国定位为功能互补衔接的“车间”和“部门”。“逆全球化”是寄期望于全球化的“逆转”，让更多的就业和机会回归一国本部。虽然近几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逆全球化”的呼声较高，但这

① 程恩富 《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经济学动态》2009 年第 12 期。

② 张宇 《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③ 刘伟、彭辉 《增量改革需要约束机制》，《上海经济研究》2000 年第 9 期。

④ 李坤望、蒋为 《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5 年第 5 期。

不是资本家的要求,而是来自处于就业劣势的普通民众或是日渐衰退的中产阶级的要求。“逆全球化”是否会真正成为潮流,取决于其是否遵循了资本的规律,国家是否能以有效的政策带动资本的回流。“逆全球化”短期内可能会对外来投资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只要中国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保持政治稳定,与各国税收政策靠近,“逆全球化”就不会造成长期的影响。

国有企业壮大可否成为延续奇迹的路径?对中国来说,壮大国有企业有三个原因:一是壮大国有企业可以提升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增加国有资本积累。而公有制经济可通过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等路径促进社会公平,减小贫富分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二是壮大国有资本让国家有更多的资源运作空间来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三是跨国企业的竞争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过去4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着力点在于“新建投资”“招商引资”“加工出口”,未来的开放则要将一部分注意力向“走出去”转移,鼓励国有企业深度介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世界领先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①已不是亚当·斯密所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而是国际资本跨国流动、大型跨国企业全面渗透各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旨在促进国有企业站上全球高点,与全球企业(甚至寡头企业)展开竞争,充分应用品牌效应、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在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所以,壮大国有企业是保证中国技术进步的“国标”,延续中国奇迹的必然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壮大国有企业、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可能会导致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一些变化,意味着国有企业可能会拥有国外企业的股权,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与资本主义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样的联系将中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双赢或多赢,对延续中国奇迹无疑是有益的。

中国经济增长会让人民群众受益吗?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到了发展的第一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发展之所以成为奇迹,是因为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人民的生活改善是同步的,这也是将减贫列为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梦中,贫困人口脱贫和国家民族复兴之间存在不可分割、必然要求和可靠支撑三重关系。^②从经济原理来看,使人民受益也是减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政府可以在财富分配上向人民倾斜,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使经济增长与人民受益成为发展这一命题的两个方面,具有可持续性。

2. 客观地看待中国奇迹的延续性

对中国奇迹的认同,一部分人停留在过去时、现在时,对其将来时报以不确定的态度。国际上,超级大国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都在,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奇迹最直接的质疑。中国崩溃论者通过放大中国金融和经济存在的问题,质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客观地说,主张中国崩溃论的经济悲观主义放大了中国经济的风险,草率地将增量的部分恶化等同于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恶化,^③将内部、外部的变化都视为中国自身的问题。当然,有的崩溃论者并不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担心”中国的未来,而是西方国家放弃对中国的刚性遏制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采用柔性策略来“制造关于中国的妖魔性话语”^④。相比国际社会过于保守甚至带着“攻击性”的答案,国内学者对中国奇迹的认识较为乐观,对中国奇迹的可持续性给予了肯定。^⑤

① 彼得·诺兰《十字路口: 疯狂资本主义的总结和人类的未来》,丁莹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② 许尔君、袁凤香《中国梦视域下的“精准扶贫”》,《邓小平研究》2016年第5期。

③ 刘元春《“中国崩溃论”为何总是崩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④ 梁玉春《“中国崩溃论”: 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红旗文稿》2015年第12期。

⑤ 郭金兴《中国经济增长30年: 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第2期;李稻葵《重启: 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第203页。

首先，对中国奇迹的理解要跳出“快”这个带有时间属性的认知。经济发展最终是以好或不好、人民满意或不满意，诸如此类带有效果特征和方向特征的词来判定的。“快”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行进中的状态，只能代表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中国奇迹的全貌。过去 40 年中国关注经济的速度，未来几十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关注其是否有利于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格局，有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破坏生态、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只有将平衡、协调和全面的发展理念融入经济发展中，才能实现以“好”为定位的中国奇迹。

其次，对中国奇迹的理解要站在世界的角度。中国解决了一些世界性难题，比如减贫成就卓越、人民生活改善与经济增长同步、人民对未来发展有良好预期等。中国的发展理念以及使用的一些非主流策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跳出西方的主流理论，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才能为发展中国家改革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答案。

再次，对中国奇迹的理解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站在中国的原始起点、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从困难度的视角理解目标的非凡性，要站在“稳”和“进”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的视角理解目标的可持续性。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即使在共性因素上，中国对“度”的把握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有差异的。如在市场、所有制问题上，中国采取的是“折中主义”，遵循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又极大地发挥了改革的作用。另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共性”因素也有着天壤之别（如人口总量、经济体量、贫困人口）。看似相同的因素，其作用的过程、路径也有所不同。如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方面与发达国家差异巨大，不能将中国奇迹简单地归因于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大量的农民工、近 2 亿的流动人口以及城乡之间广泛存在的城乡结合部都是需要关注的内容。

最后，对中国奇迹的理解要站在人民的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来观察虽然已经较为全面，但仍有缺陷，还需要站在人民的角度才能真正诠释中国奇迹，才能找到延续中国奇迹的未来方向。如过去的改革开放对资本的保护力度较大，对劳动的保护相对较差。^①在生产、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后，财富分配将成为比生产更重要的问题。

总之，不要尝试用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奇迹，只有辩证地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依据马克思提出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即从表象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方能找到解开中国奇迹的钥匙。

责任编辑：孙中博

① 陈昕主编 《“中国奇迹” 20 年：滴水湖会议实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9 页。